

往事如昨

难忘的恩情

林新忠 撰文/供图



胡桂忠(右)讲述他的故事。

2024年春,为搜集胶东兵工厂在栖霞的红色文化史料,我与栖霞老促会李渲同志一同深入当年兵工厂驻扎过的30多个村庄开展实地寻访,力求从亲历者及

后代口中挖掘第一手资料,以百姓视角真实再现胶东兵工与栖霞人民为新中国成立所作出的巨大奉献与牺牲。

在桃村镇河东村,87岁

的胡桂忠老人向我们讲述了一段发生在五十多年前、他亲身经历的感人往事,一段老区群众与南下干部之间饱含深情、永生难忘的恩情——

我叫胡桂忠,是栖霞市桃村镇河东村人。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末的一个冬天,我七岁的大儿子突然得了脑炎,先在桃村医院治疗了几天,病情没有好转,又转院到艾山脚下的144医院。医生给孩子做了腰穿检查,当天晚上孩子双眼就看不见了。我心急如焚,医生也束手无策。

到了腊月二十七,我多方打听,得知上海儿科医院医术较好,救儿心切,我立刻决定转院去上海。

我一个乡下人,到了上

海这样的大城市,两眼一抹黑,分不清东南西北,费尽周折才找到上海第一医学院附属儿科医院。临近年关,医院快要放假了。从栖霞出发时,我东拼西凑给儿子看病的钱早已花光,到上海时几乎两手空空,别说治病,就连吃饭都成了问题。

医生看我一个乡下汉子,带着双目失明的孩子,十分同情,便询问我的情况。听说我是从山东栖霞来的,医生惊讶地说:“我们院长就是你们栖霞人,你可以去找

找她。”我先是一阵高兴,随即又沮丧地叹气:“虽是栖霞老乡,可我不认识人家,一点用也没有!”

第二天,我又领着孩子来到医院。刚进诊室,医生就高兴地对我说:“告诉你个好消息,我们院长要见你。”我一听,喜从天降,仿佛一下子看到了希望。后来才知道,院长上班后,医生们向她汇报有栖霞老乡带个盲孩子看病,病情严重,家庭困难。院长当即交代,等我再来时一定要见一见。

医生把我领进院长室,里面是一位身材瘦小、四十多岁的女同志,穿着打扮和普通妇女没什么两样。一见面,她很热情地请我坐下,给我倒水。我一个乡下人在上海受到这样的礼遇,受宠若惊,浑身都不自在。

我们简单聊了起来,基本是她问我答。

她问我是哪个公社、哪个村的。我说:“我是桃村公社河东村人。”她立刻接着问:“河东的!你们村书记叫什么?你们村的老党员都有谁?你住在村子哪个位置?”她接连问了好几个问题,我都一一回答。她又问:“你住的附近,有一位老太太一只

眼睛不好?”我连忙说:“那是我奶奶!”她十分惊喜:“当年我在你们村住过,还在你家吃过饭、住过宿呢!你来得真巧,我前几天还在乡下搞社教。要是再早点,咱们还见不着面呢!”

越聊越亲近,她逐一询问村里熟人的情况,说当年还在村里写过标语,帮我奶奶推过磨。在她的安排下,我和儿子住进了医院留察室。

后来我从医生那里得知,她叫林世英,是牙山前面榆山后村人。1942年到抗日战争胜利期间的三年多时间里,她在当时的栖霞县十二区武委会担任妇女民兵干

事,常年在几个村子活动,发动妇女、民兵投身抗日斗争。解放战争时期,她参军入伍,随部队南征北战,最后转业留在上海工作。此前她到青浦县赵屯公社工作一年,回到医院后,成为儿童医院的实际负责人。

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孩子的眼睛依旧没有好转。她安慰我说:“你别着急,我们这里治不好,我再联系上海其他几家医院的医生一起会诊,看看能不能找到更好的办法。”之后医院组织了几次专家会诊,医生们都束手无策。即便如此,医院依旧按时给孩子打针吃药,期盼能有奇迹出现。

我们在儿童医院一住就是两个半月,在那里过了春节,又过了清明,来时穿的棉衣也穿不住了。我想正是村里生产队春种大忙时节,孩子的病情没有转机,再待下去也没有意义,还是早点回村里忙春吧。于是便找到她说:“大姐,我回去吧,在这里总给你添麻烦,我心里过意不去。”她说:“回去也好,孩子还小,回去一定别放弃治疗。你们那里离青岛近,可以去青岛的山大医院继续治疗,相关手续我帮你办。”

我离开上海的前一天晚上,她让人送来40元钱,说这是医院职工对老区人民的一点心意。40元钱当时对我来说是一笔巨款,我在农村一年也挣不出这么多钱。我执意不肯收。林世英安慰说:“没有钱你怎么回去,快

收下!”又说:“够不够?不够我明天再发动职工捐一点。”我连声说:“够了够了!”接过这笔沉甸甸的钱,我这七尺汉子不由地落泪了:“我在这里麻烦您七十多天,临走您还为我捐钱,我一个老百姓实在担待不起呀!”她说:“咱们是老区来的人,当年老区人民为革命连命都豁出去了,这点钱算得什么!”

其实,我在上海的那段时间,正是林世英一生中最为艰难的时刻。她的丈夫刚刚因病去世,她既要照顾五个年幼的儿子,又要主持医院的全面工作,还要牵挂着我们父子俩的吃住,还有我儿子的病情。为了我这样一个无亲无故的乡下农民,林世英这位老乡掏出了全部的真情与热情。现在回想起来,假若没有这次相遇,我们父

子俩面对的将会是截然不同的另一种命运。

回到家后,我心里一直过意不去,总想找机会报这份救命恩情。后来听说驻我们村兵营里有位干部要去上海给儿子看病,我就凑了二斤花生米和一封感谢信托他捎给林世英。虽只是区区二斤花生米,在当时我们这个偏僻乡村,也算能拿得出手的最好礼物了。

林世英在回信中说:“我的命都是老区人民给的,那点事算不得什么,是应该的!”

岁月流转,往事难忘。这段跨越山海、情系老区的佳话,不仅是我心中珍藏一辈子的温暖,更是老区人民与革命前辈鱼水情深的生动见证,也为胶东革命老区红色文化史册,添上了真挚动人的一笔。

方言撷趣

明清俗语与老烟台方言

张广育

老烟台方言里有许多特色词语,都可以从明代、清代的俗语中找到源头,其间有微妙的承袭关系,或者出于什么渊源,又有哪些故事,值得发掘。

先看以下几例。

“刺闹”

明代通俗小说《西游记》第五十二回“刺闹杀我也”,可见明代已有此俗语。它表示瘙痒很奇特,找不着准地方,感觉怪怪的。明末济南人西周生所著《醒世姻缘传》第四十九回有言:“他刺挠的不知怎么样”,这里的“刺挠”不是生理性的感觉,而是心理性的坐立不安,浑身上下不自在。这种微妙的语义转化,涉及所谓通感。其实老烟台方言的“刺闹”也兼有心理层面的含义。比如说“这人挺刺闹的”。如果“刺闹”和“刺挠”二选一,我觉得“刺闹”生动且传神,带着应有的感情色彩。

“嘎古”

此语形容由内心到面相的阴而狠,但又不到凶恶的程度。清代蒲松龄的《聊斋俚曲·姑妇曲》写作“生古”,用以刻画恶婆婆于氏的形象。这证明此语在清初已广泛应用于山东许多地区。它的妙处在于读音对语义的强化作用。

“扎裹”(裹字读轻声)

这个词意思是梳妆打扮,但又微含嘲讽之意。上述《聊斋俚曲·姑妇曲》写作“扎挂”(“扎挂的合妖精似的”)。说“扎裹”就比说“梳妆打扮”传神得多。

“滥水”

老烟台奇山所城内外外的水井,大多数是“滥水井”。所谓“滥水”,也有写作“潞水”,其味咸、涩、苦,勉强可饮用。清代学者朱骏声在所著《说文解字定声》中解释“滥”字:“今京师谓井水苦涩者为滥水”。此外再找不到别的地方有这么用的。它是如何从北京流传到老烟台的?其中可能有特殊的理由。

“器”或“罨”

方言中特指纸张、布帛、衣被等柔软物体的厚度很薄。明代中晚期白话小说《金瓶梅》就有“罨纱片子”的说法,但是这个“罨”

字用得很勉强。时间稍后,宋应星的《天工开物》介绍一种民间粗织品“蕉纱”,说“闽中取芭蕉皮析缙为之,轻细已甚,值贱而质朽,不可为衣也。”他用的是“朽”字。《汉书·地理志》颜师古注“玄朽”：“朽,虚也,亦薄也。”看来还是该用朽字。

以上老烟台方言中特色词语的源头都是明清俗语。这并不是说就没有来自元代以前的。不过大体可以得出结论,明代以后的占多数。

如果变换一下思路,从明代往下追溯,结果就更加明显。现在我们就回到明代中晚期,以当时的通俗小说《金瓶梅》作为样本,寻找它的语言在后代遗留的痕迹。

《金瓶梅》假托明代清河县作故事背景,实际上写的是当时山东西部运河边的临清。那时候临清是北方最大的商埠,是北方最重要的运河漕运码头。影响所及,临清的语言也成为当时北方最流行的官话。《金瓶梅》所用的语言就是这种官话的样本。它最有资格代表明代俗语。下列俗语就是由《金瓶梅》里选出的,括号里是简要解说。

“将好”(刚刚好)、“夜来(来字轻读)”(昨天)、“使的”(累的)、“早般(般字轻读)”(早早的)、“鼾睡(睡字轻读)”(打呼噜)、“霸拦”(孩童的蛮横)、“奏饭”(做饭)、“干营生”(做事,隐指某事)。

令人惊异的是,它们竟与老烟台方言的特色词语完全相同,令人不由得会产生时空穿越之感。当年临清竟有如此强大的文化影响力!其实这并不奇怪。晚明商品经济和城市经济的繁荣,以及随之而来的人流、物流、信息流的活跃程度,都超乎我们的想象。这只要看看《金瓶梅》和“三言二拍”就可以知道。以临清为代表的北方官话和商业文化,穿越千里,在偏处海隅的奇山所,留下明显的痕迹,乃是很自然的。除此之外,或者也有别的偶然因素在发挥作用,有待方家进一步考证。